

四川一家非  
法教会的牧师王  
怡被控煽动颠覆  
国家政权罪、非  
法经营罪，获9

年有期徒刑。西方一些舆论对此做出激烈反应，有美国高官甚至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妄言王的罪名是被“罗织”的，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将他释放。

不需增加额外的信息，仅仅通过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国人就能一眼看出，王怡不是普通的牧师。西媒称赞他是中国的“异议学者”，他不仅创建了非法的教会，并且通过它从事煽动性的政治活动，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与该教会融为一体。

客观说，普通中国人都能大致明白王怡在触犯法律，这个人有些逞能，或者他早就做好了受到法律制裁的准备。这样的异见人士在中国是有一些的，他们被西方价值观洗脑了，从根本上就不接受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而且

# 别秀悲壮了，这不过是又一炮灰故事

反感。  
随着这种摩  
擦增多，中国人  
愈发认定美西方  
势力对中国人真

因为受到西方的支持而有恃无恐。王被判刑应当说一点都不令人奇怪。

众所周知，中国是充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从没听说过哪个人因为信仰某个宗教而被抓。然而宗教信仰自由与宗教活动接受中国法律体系的管理，这是一个硬币不可或缺的两面。在中国成立宗教团体需要经过批准，而且宗教组织不能从事世俗世界里被禁止的政治活动。那些吃了官司的人都是因为犯了后面的这些禁条。

王怡对法律的触犯尤其具有代表性。按照西媒的报道，他组织成立的教会就没有经过审批，而且从规模到活跃程度都在非法宗教团体中走到了很突出的位置。除此之外，他本人的政治立场

展示和其教会的活动都经常拿中国宪法碰瓷，表现得非常嚣张。

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在美国不断煽动对抗宪法，有言有行，他在那边也是会出问题的。在哪里就要遵守哪里的法律，在中国对抗这里的法律，却要从美国司法和价值体系中寻找说辞，此路不可能通。

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势力希望搞中国，他们通常没有手段在中国搞大范围的动员，于是就把少数中国异见人士当成杠杆。美西方隔一段时间就会给一名中国异见人士戴上高帽，并将因此同中国发生的冲突贴上人权斗争的标签。可悲的是，美西方势力的这种操作只能在他们那边自娱自乐，却同时招来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

正关注的权利没有兴趣，他们就是在找中国的茬，在西方的语境下给中国罗织罪名。西方世界对华的价值分歧被那些人浇上汽油点成夸张的火堆，他们围着火堆自以为是的狂欢。

可怜有少数中国异见人士至今以为，美西方的那些火堆是为他们点的。其实他们只是当中的几根劈柴。在中国高速发展的时代，在美西方一些人对中国的发展就是接受不了且产生怨恨的时候，有的中国人成为美西方舆论指摘中国的噱头，这当中怎么可能遵循的是公理和正义？这些故事的编纂逻辑注定是肮脏的。

中国的异见人士系列其实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炮灰连续剧。再多过一些年头回头看时，这一点或许能看得更清楚些。▲



## “平民主义”错译成“民粹主义”，该纠正了

潘维

“民粹主义”是英语“populism”（平民主义，反义词是“elitism”精英主义）的诡异中文译法。尽管“populism”有些微的自嘲贬义，大体还属中性，欧美不少著名政治家自称“populist”，即“平民主义者”。但当前的中译“民粹主义”有明确贬义，甚至有“民之纳粹”的联想，以致当今不少中国学人理直气壮地著文谴责之。当中文的“民粹主义”反译回英文，只可能是“populism”，不可能译为让西方人莫名其妙的“大众纳粹主义”。

“民粹”译法起初并无贬义，而是“民之精华”的褒义。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有俄国“平民派”流亡日本，在东京的中国同盟会会员曾寻求其帮助；大概受日文“国粹”启发，译其名为“民粹”派，以对应“群氓”。这种译法也能避免与“democracy”（今译“民主”）当初的一种流行中译“平民主义”混淆。“民粹”变成明显的贬义词，应来自中国共产党人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翻译列宁著作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激烈批判俄国的“平民派”，因其强调俄国农村传统村社的社会主义性质，间接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虽沿用“民粹”旧译，被列宁批判的思想当然是“反动思想”。

今天再无理把“populism”译作“民粹主义”，而应准确译为“平民主义”。

探讨平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基本是徒劳的。当代平民主义的核心主张仅是反对精英践踏平民利益和蔑视平民智慧。人类社会的区隔，首先是男女性别，其次是精英与平民，再次才是阶级、族裔、国家等。所以，平民与精英之分很抽象，并不必然有明确的政策取向，也同是否属于“极端主义”无关。同样，主张妇女权利的人，在政治立场上可能是右派，也可能是左派；既可能温和也可能激进。平民和精英两种主义的主张者中既有政治、经济、社会的左派，也有政治、经济、社会的右派，当然还有中间派。所有左、中、右的政治主张，无论温和或激进，都可能倾向平民，也可能倾向精英。

在私有制消亡之前，精英与平民是对几近永恒的悖论。不彰显智慧与平庸的差异，要求精英为广大平民无偿做奉献，社会就平等，大多数人就不会感到痛苦，但代价是全社会的平庸。但倘若对个人智慧报以包括财富在内的对他人的支配权，就生出追求支配权的精英集团，代价是广大平民感到痛苦，感到相对被剥夺、被支配，进而导致社会分裂。个人智慧相对贫乏的群体因愚蠢而被淘汰，个人智慧相对丰富的群体因社会分裂而被淘汰。常有强调社会平等团结的群体被强调个人私欲的群体击溃，也常有强调个人私欲的群体被强调社会平等团结的群体击溃。

传统中国为何不盛行“平民主义”说法？与西方传统社会有法律规定的严格阶级地位分际不同，中国小农社会缺乏实行长子

继承的客观条件，“富不过三代”，阶级分际既不清晰也不稳定，所以中国古人早就意识到平民与精英的相互依存性。《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就声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带有北方游牧生活遗传的唐朝，把精英与平民分得比较清楚；但也说精英与百姓是舟与水的关系，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后人与唐人不同，倾向用鱼与水、骨与肉的关系形容精英与平民的关系。“民本”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思想根源，与近代西方流行的“民主”相得益彰。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为什么全球盛行对抗精英主义的平民主义？第一大原因是世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出现质变；第二大原因是市场的全球化迅猛发展。

从种植和养殖的财富，到近代制造的财富，又到而今设计研发出的无形财富，世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处于剧变中。极少数精英遥遥领先，赢家通吃，甚至把很大一部分精英也变为平民。仅6000万人口的法国拥有深厚的高科技制造传统。而今法国教授月薪两三千欧元，与清洁工和卡车司机相同；但披上“洋马甲”的精英，月薪高达十几万欧元。法国社会分裂，再无力创造空客奇迹。在社会平等环境里成长的法国教授们，站在所有抗议运动前列，并非偶然。

冷战后，近14亿人口的中国给全球化注入了巨大动能，也让总共不到10亿人口的发达国家感受到巨大压力。在全球化中获利最多的美国和中国，平民与精英在收入鸿沟上的扩大速度也最快，所以两国都是平民主义的温床。美国政权被反全球化运动劫持，自称“平民主义”政权，并非偶然。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誓言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亦非偶然。

号称能左右人类未来的技术乌托邦，是精英主义在今天的突出表现。资本界以未来科技之名圈钱，号称无脑的“智能”将代替人脑，诱惑不做也不懂算法技术的文科生做公关，忽悠了经济政治精英，还人为制造出平民即将被先进技术淘汰的恐慌。如果开放的全球金融化是未来，开放的香港模式就是人类未来，平民就只能像香港居民那样靠炒房养老。如果迷信未来的人工智能和市场化将很快解决医疗资源短缺，眼下医患关系的恶化就不值得重视。对未来技术控制社会的迷信，对市场机制万能的迷信，对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迷信，使精英话语挟持议程，与平民话语和平日日常生活的关切渐行渐远，甚至让不少金融骗子钻了空子，把平民当“韭菜”收割。

反思时下的精英主义倾向，笔者呼吁，勿用“民粹主义”，改用正常、中性的“平民主义”。▲（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在2010年代的最后一天——2019年12月31日，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的冲击。事实上，最近一个月来，美国与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冲突不断。由于美国驻伊拉克基尔库克等地的军事基地接连遭到袭击，美国于12月29日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旅”进行袭击，导致后者数十人死亡，而12月31日发生的美国大使馆遇袭事件无疑是什叶派民兵的报复。当然，华盛顿自然把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视为伊朗支持的力量，并把矛头指向伊朗，使得该事件与美国和伊朗的地区博弈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尽管美国在中东的遇袭屡见不鲜，但“伊拉克”这个与美国结下不解之缘的字眼，令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在年代交替之际拷问美国的中东政策以及未来

组织仇视的对象。

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在中东最为辉煌的十年，克林顿“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战略使中东维持了基本的平衡，最终却无果而终。巴以和平逆转为持久、且时断时续的冲突，伊朗和伊拉克也并未臣服，而美国与伊斯兰极端力量的仇恨却在不断累积和爆发，美国在中东的目标多次遭袭。

进入新世纪后，导致美国发生战略错乱的“9·11”事件爆发，结果是美国错误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持续至今，美国对不断坐大的塔利班束手无策；2011年，伴随奥巴马为抽身中东撤军伊拉克，伊拉克战争“被结束”。也正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急于从中东抽身的美国进退失据，其内在矛盾是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和成本减少，使其根本无力主导剧

## 美国遭遇中东之殇

刘中民

美国在中东的命运。

相对于欧洲列强，美国在中东是一个后来者。二战前，美国与中东的来往主要是商业和文化关系。二战后，美国全面取代欧洲在中东的地位，并伴随冷战的展开与苏联在中东展开了全面争夺。尽管美国在阿以冲突中对以色列的偏袒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反感，但由于当时中东的阵营对抗，以及美国在中东尚无大规模直接的军事介入，美国似乎也并非中东国家十分仇视的对象，它通过以色列、土耳其、沙特、伊朗（1979年以前）等地区盟友抗衡苏联，维护自身的利益。

美国在中东的麻烦源于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伊朗从亲美走向反美，尤其是愤怒的民众占领美国大使馆并扣押美国人质事件，令美国在中东名誉扫地，美国与伊朗的对抗由此延续至今，这也是美国在随后爆发的两伊战争选择支持萨达姆政权的原因所在，当然这也埋下了伊拉克地区霸权膨胀，进而引发1990年海湾危机、致使美国发动海湾战争，乃至也埋下了2003年美国再度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孽缘。而同在1979年爆发的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基于反苏需要支持“基地”等“圣战”组织，而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长期驻军沙特，使美国成为“基地”

烈变动的中东地区事务。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斯兰国”的滋生、伊朗的崛起、叙利亚危机的久拖不决，都是这种困境的产物，而以民主改造为核心的“大中东计划”早已淹没在阿拉伯大漠之中。

及至特朗普主政，美国中东战略在本质上继续收缩，剿灭“伊斯兰国”、遏制伊朗成为特朗普的主要目标，但其主要做法是减少投入，利用地区盟友冲锋在前，并从中捞取军火收益，服务于“美国优先”的目标。当前，遏制伊朗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主线，但以避免发动战争为底线的美国，尽管通过政治施压和经济制裁重创伊朗，却无法颠覆伊朗政权。相反，“阿拉伯之春”以来，伊朗对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也门什叶派力量的影响不断增强，使伊朗打击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已经从波斯湾扩展至地中海，当前美国在伊拉克的遭遇就是这种逻辑的体现。

纵观历史，美国在中东的遭遇再次演绎了“中东是霸权的坟墓”这一逻辑。美国不断在中东扩张霸权，但其霸权在中东是“不折不扣地建立在沙滩之上”（布热津斯基语），甚至导致“老鹰坠地”（沃勒斯坦语）；美国不断在中东输出意识形态，收获的却是“文明冲突”这一“自我实现的预言”。▲（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